

桑志华与北疆博物院

王磊^①

Sang Zhihua & The Northern Border Museum

Wang Lei

清代以降,经历了康熙初年反教运动的波折之后,在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1623-1688)的呼吁之下,法国耶稣会开始分批派遣耶稣会士来华从事传教与科学活动。17世纪中后期,法国传教士洪若翰(1643-1710)等人来华,开拓了中国天文学、地理学领域的研究。18世纪初,在法国耶稣会士的指导下,清朝政府进行了全国范围的地理考察与大地测量。19世纪中后期,法国神甫阿尔芒·戴维(1826-1900)在四川境内发现大熊猫;同时期,徐家汇观象台建立,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韩伯禄(1836-1902)在长江流域开展大规模的动植物标本采集活动,并建立了徐家汇自然博物院。总体而言,法国耶稣会在中国的科学发现事业,得到了尚算顺利的开展。

1914年,法国耶稣会神甫、地质学家、古生物和考古学家桑志华^②(1876-1952)自

巴黎出发,经欧亚大陆,从满洲里入境来到中国。耶稣会在中国的科学活动所获得的大量发现,深深吸引了当时在法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桑志华。因此,在取得了博士学位之后,桑志华便启程踏上了这片在他看来仍有许多宝藏尚待发现的东方大陆。1914年3月25日,桑志华抵达天津。此后,桑志华在华25年间的活动,可以从科学考察、科学研究及北疆博物院的创立这三条线索分别加以阐述。

一、二十五载,栉风沐雨:桑志华的在华科考

1912年,桑志华在写给献县天主堂耶稣会的报告中,对未来来华考察做出了规划,并将考察重点明确置于中国北方。“当时的中国和中国北方,尤其是这一地区深远地区——黄河流域、蒙古腹地、西藏附近,不论从科学还是从经济学的角度上看,对它的地

^① 王磊:天津自然博物馆自然发展史研究中心,从事北疆博物院图录编辑工作;通讯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31号;邮编:300201;Email:764715304@qq.com。

^② 桑志华,原名保罗·埃米尔·黎桑(Paul Emile Licent),来华后取名为桑志华(Sang Zhihua)

质和动植物区系人们还一无所知，许多有待发现的宝藏，仍留在那里”。桑志华计划较为系统地考察所有注入渤海湾的各水系如黄河、白河、滦河、辽河等及其流域地区，收集地质学、史前学、古生物学、植物学、动物学、人文学、经济学等各学科、各方面的资料与标本。桑志华依靠献县教区、法国尚柏涅教省及法国外交部提供的有限经费，以各地的天主教耶稣会为落脚点与给养站，解决食宿、交通及标本化石的运输问题。

来华的最初三、四年间，桑志华对中国北方的了解较为缺乏，大多时间往返于河北与山西之间，对所到之处的动植物进行一般性采集，积累资料。尽管这一阶段的采集与发掘东鳞西爪、未成体系，但正是依赖于这种广泛的探查与摸索，使桑志华对中国北方的地形地貌有了初步了解，也为他深入北方腹地奠定了重要基础。

1918年春，桑志华开始了对中国北方腹地的考察。这一年，在山西-陕西-甘肃-青海一线上，桑志华收获颇丰。1919年初，桑志华继续在甘肃兰州至青海西宁一线进行发掘与采集。同年6月，他北上甘肃庆阳，在庆阳以北约55公里的辛家沟和赵家岔发现了丰富的上新世——蓬蒂期化石，这是由他发现的第一块未被开垦的处女地。而甘肃庆阳的重大发现，也使他在中国北方的科学考察有了更为明确的目标和线索。

甘肃庆阳的收获，促使桑志华在1920年大举进军西北。历时半年之久，在陕西红柳河（鄂尔多斯）到甘肃庆阳一带进行大规模发掘，发掘出标准的蓬蒂期动物化石。在幸

家沟与赵家岔发掘出土的一件石核及两件石片，是当时在中国境内首次出土的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这三件石器的出土，打破了自1882年以来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中国北方不可能有旧石器的论断，更将我国的文明史上推了几十万年之久。

此后，为了寻找第四纪化石，桑志华的勘查工作延伸到了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的萨拉乌苏河附近，在此发现了相当丰富的更新世晚期哺乳动物化石，共计30余种，其中包括完整的披毛犀和野驴的骨架、王氏水牛、豹的头骨等。同时发现的还有大量石器，以及一颗人的门齿，也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界的河套人牙。河套人牙的发现，填补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中国的古人类研究从此也正式拉开序幕。

桑志华在中国北方的重大考察发现，引起了当时法国学术界的高度重视。1923年，法国耶稣会神甫、古生物学家德日进（1881-1955）应邀来华，与桑志华组成“桑志华-德日进法国古生物考察团”。考察团先后前往内蒙古三盛公（1923年）、萨拉乌苏河地区（1923年）、宁夏灵武水洞沟（1923年）及张家口以北戈壁东部地区（1924年）等地，发掘了大量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石器以及动植物标本。

为期两年的“桑志华-德日进法国古生物考察团”合作结束后，1924年9月桑志华前往河北宣化桑干河一带考察，首次接触河北泥河湾地层。1925年4月至10月六个月内，桑志华三赴阳原泥河湾，发现了大量中国早更新世地层动物化石，包括剑齿虎、爪兽、

水鹿、三趾马、鬣狗以及相当数量的真马化石。其中包括目前所知最早记录的四不像鹿化石以及我国已知最古老的牛科、我国北方第四纪指示性化石——古中华野牛。

1926年自法国返回天津后，桑志华与再度来华与他合作的德日进一起，经潼关到山西太原洪洞一带考察。9、10月间，桑志华第五次赴泥河湾考察采集。1927年，桑、德二人北上辽宁锦西，又赴赤峰，再至河北围场等地。1928年，桑志华前往东北考察第四纪化石地点。1929年，5月初陪同德日进再返东北补查。6月中，桑志华第六次前往泥河湾。

1930年至1933年，桑志华或独行、或结伴，先后对北京西部香山、西北部延庆地区、沙城、新保安的山区进行动植物标本的考察采集（1930年），赴山东沿海、内蒙古商都至集宁一带进行考察发掘（1931年），在山西榆林西南部到靖边挖掘化石和新石器（1932年），在山西省北部沿恒山和芦芽山进行高山植物的采集（1933年）。

1934年6月末至8月初、1935年5月末至6月中，桑志华两赴山西榆社盆地，发现并采集了丰富的上新世哺乳动物化石，以质量、数量论，都超过了他采集过的任何一个地点的化石，而且是唯一的一批基本上没有运出中国的化石，也是桑志华在华25年科学考察中的最后一个重要发现。

1938年，欧洲与中国皆陷于战火之中，桑志华迫于战争爆发及经费枯竭等原因，不得不终止了在华科学考察并返回法国，结束了在华的二十五载考察。

二、二十五春秋，辉煌始成：北疆博物院的建设与开放

北疆博物院的建立，自桑志华来华之初便已开始筹备。1914年6月，桑志华抵达天津后，献县教区指定位于法租界内的圣路易斯路18号崇德堂为桑志华的活动基地，亦即北疆博物院的筹备处。最初，桑志华采集的标本、发掘的化石都暂存于此。此后七年间，桑志华从各地搜集的资料，采集的动物、植物、岩矿、古生物、古人类标本等逐年增多，终致无法容纳。

此时，桑志华向教会提出了建立博物馆的请求。这一请求，得到了献县教区耶稣会会长的大力支持。这位会长将正在筹建中的工商学院内的一块地皮划拨给桑志华，用于博物院建设。博物院作为一家独立机构，与毗邻的工商大学同属于耶稣会管理，便于往来合作。

1922年4月，北疆博物院北楼（相对后来所建南楼而言）破土动工。同年9月，工程告竣。北楼为砖混结构，共三层，高12米，占地面积300平方米，由比利时与法国合资的义品公司设计建造。楼内设有三个实验室、一个办公室、一间暗室、两大间藏品库及一个作业室。

此后，因来访者的增多、藏品数量的增加以及大型标本整理安放的需求等多种因素，于1925年促成了陈列室的建设，并于同年竣工。陈列室建于北楼西端，由法国永和营造公司设计建造。陈列室与北楼相通、同为三层，一、二层用作陈列，三层作为库房用以存放物品。陈列室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并首

次采用了具有美学外形的中心牛腿柱式的内聚框结构；出于博物馆使用的特性考虑，设计采用了一系列防火、防盗、防尘和防震等安全措施，并利用将平板花玻璃镶嵌在钢筋水泥窗框内的方式，利用天然光线采光，既保证了密闭性又能自然通风，还可以使标本免受细沙与雨水的侵袭渗透。其设计理念和水平，在当时而言亦属先进。

1929年，北疆博物院再度扩建，新建南楼仍由法国永和营造公司设计建造。南楼与北楼平行排列，共分两层，内设三个实验室、一间图书室、一间办公室及两大间藏品库房。南北两座建筑，在二楼以通道相连。至此，北疆博物院建设全部完成，三座建筑相连接，整体形成“工”字结构。

北疆博物院于1925年5月5日下午举行开馆仪式。桑志华将其命名为“Musée Hoangho Paiho”（意为黄河白河博物馆），中文名为北疆博物院。1928年起，北疆博物院正式面向社会开放。北疆博物院公开展出的藏品，大部分是永久性的，以壁挂式展柜陈放方式展出。一楼展出地质学、古生物学、史前学和人类学藏品，二楼展出现生动物学与植物学藏品。展品标签皆以法文书写，标题则以中文与英文相对照。此外，博物院还编写并出版了法文版的《参观指南》。

到20世纪30年代，以桑志华授勋和德日进担任北疆博物院副院长为标志，北疆博物院已成为具有世界声誉的一流博物馆。瑞典国王太子、英国公主均曾到访，各国驻华公使亦是频频前来，也引起了对古生物学有着浓厚兴趣的日本裕仁天皇及皇室成员的特

别关注。上世纪30年代，日本皇室成员多次与北疆博物院进行互访交流：日本天皇还曾指示陆军本部参谋长致信桑志华，表示愿意出版北疆博物院的所有著作；1938年9月，接替桑志华担任北疆博物院院长的罗学宾，还与德日进、汤道平一起，专程前往日本做了为期一个月的访问学者。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1938年，桑志华被迫回到法国。两年之后，他的继任者罗学宾也离开了北疆博物院，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了北京。20世纪40年代以后，博物院终迫于战事及经费枯竭等原因，停止了一切工作，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被政府接收。

三、上下求索，硕果传世：北疆博物院的科学研究

桑志华设立博物院的初衷并不限于陈列展示，而是希望以科学考察所得作为科学研究的有力保障，最终达到解决科学问题的目的。具体来说包括：通过科学考察搜集各种地质学、古生物学、人类学、动植物及历史和经济学资料，以备研究之用；将藏品整理、鉴定后安置于博物馆内；根据藏品和文献资料进行研究，出版刊物和发表学术论文等。

同时，为保障考察和科学研究能够顺利进行，博物院配备了实验室、图书室。实验室所配备的各类设备相当完善齐全，包括各式显微镜、解剖镜、切片机等各类处理、鉴定标本所需设备，以及经纬仪、高程仪、罗盘、气压计等科学考察所需测量仪器。图书室藏书数目超过17000册，集中收藏考察地

区内的相关资料，专题文献编目与藏品分类相对应，以便更好地为研究人员及其合作者提供相应资料。

此外，博物院还与许多欧洲博物馆保持着联系和交往，并聘请了各学科的专业研究人员进行科研工作。在桑志华主持博物院工作的二十几年间，北疆博物院的研究人员总共鉴定和发表模式标本 200 余种，列入自然科学文献记载的标本有 1100 多件。北疆博物院将研究结果以馆刊形式共计发表 51 期，在其他各类学术期刊发表著述共计 74 篇，内容涉及古人类学、植物学、动物学、古生物学、地质学等多门学科。

由桑志华组织的多次以中国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北方地区的自然科学考察，为北疆博物院的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考察中，他不仅采集、发掘了大量标本，同时记载了每件标本的初步鉴定、采集地、生境等相关信息，还在野外工作笔记中科学详尽地记录了考察地的天气、地形、物候以及观察到的动植物、标本的采集过程，乃至当地的经济、人文、历史等，并配以路线图、剖面图和大量的照片，这些都是弥足珍贵的研究资料。

尽管对于桑志华本人而言，其对于科学考察、采集发掘的兴趣实过于其对科学研究的兴趣，但在华的 25 年间，桑志华仍取得了较为丰硕且重要的成就，出版了《中国的旧石器时代》。目前保存下来的记述其考察活动的出版物主要有《黄河、白河流域十年

(1914-1923) 考察报告》(共四卷)、《黄河、白河流域十一年(1923-1933) 考察报告》(共三卷)，以及发表于《法国里尔市地质学会通报》上的《桑志华在华北、内蒙和西藏的业绩(1924-1925)》等。在德日进来华后，二人更是通力为古哺乳动物、古人类研究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发表了论文《得自萨拉乌苏河的一颗被认为属于更新世的人类牙齿化石》^①。此外，桑志华还对北疆博物院的研究成果做了一些目录学的工作，整理出版了《北疆博物院著作目录评述(1914-1933)》。

三度来华与桑志华合作的德日进，最主要的研究成果是对四个重要地点(甘肃庆阳、河北泥河湾、内蒙萨拉乌苏及山西榆社)的古哺乳化石的研究。德日进以独立、合作的形式，先后发表了《关于中国和蒙古第三纪哺乳动物的描述》、《关于晋南、豫北第三纪上部与第四纪层系的观测报告》、《关于桑干河动物区系的古生物学笔记》、《泥河湾的哺乳动物化石》、《在中国北方现代动物区系(哺乳类)地理分布的某些新资料》、《关于大陆哺乳动物区系缓慢进化的观察》等多篇文章。

据邱占祥先生统计，德日进一生在自然科学方面发表的论文及各种短文中，直接涉及到中国的地层和古生物的，直接描述或基本基于北疆博物院的材料而撰写的文章，数量相当可观，所占比重也几乎是其全部著述的半数之多。德日进在中国哺乳动物化石材

^① 《得自萨拉乌苏河的一颗被认为属于更新世的人类牙齿化石》为桑志华、德日进与步达生共同发表。

料中建 14 个新属和 84 个新种,其中基于北疆博物院的标本的新属 10 个(约占所建新属的 71%),新种 56 个(约占所建新种的 67%)。可以说,德日进在华的二十余年,是其一生的科学研究工作中最为宝贵的时期。而他在北疆博物院取得的学术成就,绝不仅仅为他日后的科学研究创造了良好的开端,更是重要且坚实的基础所在。

此外,从 1914 年桑志华抵津,到 20 世纪 40 年代北疆博物院一切事务因战争及经费原因全面停止,在这接近 30 年的时间里,先后有亨利·塞尔、金道宣、罗学宾、汤道平等十余位外籍研究人员前来进行合作,取得的科研成果也相当丰硕。

四、结语

2014 年,时值天津自然博物馆建馆 100 周年暨桑志华来华科学考察 100 周年,天津自然博物馆正式启动了北疆博物院的全面复原工作,恢复其原有的陈列展示、标本收藏、科学研究及科普教育的功能。北疆博物院的修缮,整体秉承修旧如故的原则,对室外地面、建筑外墙、室内装饰、墙体、地面等处进行了维护与修复,对展厅面貌进行了全面复原。

陈列室的布展,复原了当时一楼展出地质学、古生物学、史前学和人类学藏品,二楼展出现生动物学与植物学藏品的展出格局。展出了桑志华在甘肃庆阳、内蒙萨拉乌苏、河北泥河湾及山西榆社四大地区发掘的古哺乳、古人类化石,包括披毛犀、野驴骨架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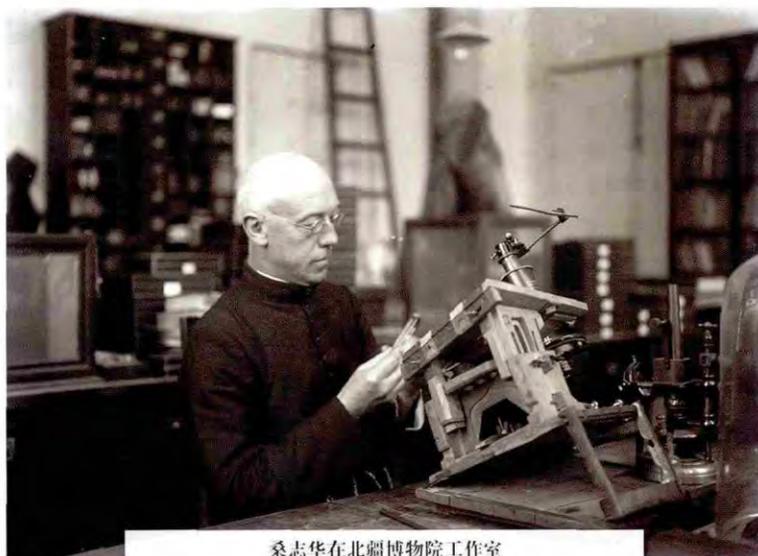
“河套人”牙等珍贵藏品近 20000 件。“触摸历史感受北疆——桑志华和他在天津的事业”的专题展览,则对桑志华在华的科考事业及北疆博物院的创建历程进行了全面的展示回顾。

桑志华的伟大不止在于战乱年代中,在匮乏的物质条件下,二十五载未易其志,坚持在华的科考活动;不止在于几乎是穷尽了半生的心血、筚路蓝缕,建立了北疆博物院,并使之闻名于世界;最重要的是,他将半生科考事业的大部分成果都留在了中国。战乱年代中,桑志华为科学事业做出的努力与奉献,凝聚于如今北疆博物院的藏品、建筑之中。路漫漫其修远兮,正是有了此种精神的激励,我们也将为新时期的博物馆事业求索不辍,心之所善而九死未悔。

参考文献

- [1]陈锡欣,郑宝芳,李国良.栉风沐雨八十春[A].陈锡欣主编.天津自然博物馆 80 年[C].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47-69.
- [2]邱占祥.桑志华和他的哺乳动物化石藏品——试谈桑志华藏品中哺乳动物化石的历史及现实意义[A].孙景云主编.天津自然博物馆建馆 90(1914-2004)周年文集[C].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6-10.
- [3]孙景云,张丽黛,黄为龙.德日进与桑志华在中国北方的科学考察[A].孙景云主编.天津自然博物馆建馆 90(1914-2004)周年文集[C].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15-18.
- [4]刘扬,侯亚梅.法国学者对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贡献及其相关遗址的研究进展[J].文物春秋,2012,4:7-10.

桑志华与北疆博物院



桑志华在北疆博物院工作室



1923年北疆博物院工字楼鸟瞰



北疆博物院南楼古生物库房



桑志华向北疆博物院工作人员讲授昆虫学



北疆博物院图书室

桑志华（1876—1952），原名保罗·埃米尔·黎桑（Paul Emile Licent），出生于法国北部里尔大区的伦比斯镇，为法国天主教耶稣会会士、地质学家、古生物和考古学家，来华后取名“桑志华”。

1914年至1938年，桑志华在华的25年间，对中国北方地区进行了行程达五万公里的科学考察，发掘采集古哺乳动物和古人类化石、岩矿标本、现生动植物标本等共计20余万件，其中尤以甘肃庆阳、内蒙萨拉乌苏、河北泥河湾及山西榆社四大地区动物化石的完整及丰富程度享誉世界。

北疆博物院自桑志华来华之初筹建，1922、1925、1929年分别完成北楼、陈列室及南楼建设，整体形成“工”字形的建筑格局。北疆博物院在1928年正式面向社会开放，上世纪30年代曾被誉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博物院”。

桑志华开创了我国北方野外发掘和科学考察的先河，实现了我国古生物、古人类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是我国古哺乳动物学开创时期一位不容忽视的人物，为我国古哺乳动物学的诞生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见正文87~92页）